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研究丛书》

资源的集聚与分配：

华北村庄在近代以来权力下延中的变迁

Ziyuan de Jiju yu Fenpei: Huabei Cunzhuang zai Jindai yilai Quanli Xiayan zhong de Bianqian

唐海华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研究丛书》

资源的集聚与分配：

华北村庄在近代以来权力下延中的变迁

唐海华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源的集聚与分配: 华北村庄在近代以来权力下延
中的变迁 / 唐海华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677-9971-4

I. ①资… II. ①唐… III. ①农村经济—资源分配—
研究—华北地区—近代 IV. ①F3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2332 号

书 名: 资源的集聚与分配: 华北村庄在近代以来权力下延中的变迁
ZIYUAN DE JIJU YU FENPEI HUABEI CUNZHUANG ZAI
JINDAI YILAI QUANLI XIA YAN ZHONG DE BIANQIAN

作 者 唐海华 著
策划编辑 黄国彬
责任编辑 沈广启
责任校对 王瑞金
装帧设计 黑眼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路 501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行电话 0431-89580028/29/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 jdcbs@jlu.edu.cn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7-9971-4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摘 要

华北地区的村庄在结构上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以自耕农为主的阶级结构及向内凝聚的共同体网络，使华北村庄成为一个资源的自然集装箱。近代之前，华北村庄处于封闭自治的状态，与国家政治的联系微弱。但是自清末新政以来，政治权力向基层社会深入延伸，作为资源集装箱的华北村庄成为各种政治权力进行资源集聚的便利工具。但摊派模式的粗陋导致华北村庄陷入内部失衡与对外紧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进入华北地区。经过多年的税制摸索与改革，中国共产党在资源集聚上形成了以华北村庄为基础单位、以分数制为核心机制、以数目字调查为基础的模式，从而使之变得更高效、合理。减租减息政策所推动的根据阶级路线的资源再分配，使华北村庄变得更加平均和稳定。二者的结合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获得了坚实基础和巨大发展。

抗战结束后，宏观环境的变迁使这一社会动员模式的具体形态有所变化，村庄内的阶级再分配变成更加突出的重点，但华北村庄的边界在经受冲击之后进一步固化，华北村庄的集聚功能因此也更加强化。总体上，这种村庄集聚与阶级分配相结合的动员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由此也深刻影响到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001
一、研究目标	001
二、文献综述	002
三、理论工具：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	018
四、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028
第二章 近代中国国家权力扩张下的华北农村	037
一、华北村庄的特征	037
二、近代国家政权扩张下华北村庄的动员化	050
三、摊派模式的弊病：待解的村庄动员难题	058
第三章 进入华北农村：抗日战争初期中共的村庄动员	066
一、从山地到平原：中共在华北的迅猛发展	068
二、村庄动员模式的初步探索：村合理负担的设计	079
三、村合理负担的缺陷：公平与激励问题	095
第四章 村庄动员模式的改进：统一累进税的实施	102
一、走向数目字管理：统一累进税改革的核心	103
二、统累税改革的调查难题：村本位主义	109
三、统累税调查的策略及实现	117
四、统累税与村庄动员的关系：属人属地问题	120
五、中共对华北村庄政权的改造：村庄动员组织基础的形成	124
六、抗战时期中共社会动员模式的新特征	143

第五章 阶级动员的升温：抗战后期的减租减息运动·····	154
一、“恩赐减租”：抗战前期的阶级动员·····	154
二、“熬时间”：相持阶段的困境与中共在社会动员上的战略调整·····	159
三、走向群众运动：战略反攻阶段的阶级动员·····	167
四、小结：两种动员之间的关系·····	178
第六章 村庄动员与阶级动员的变奏：土地改革运动的激进化·····	185
一、阶级动员的加强：从清算斗争到“五四指示”·····	185
二、村庄动员的危机与土改运动的激化·····	195
三、激烈斗争运动与村庄动员之间的互动·····	222
第七章 结语·····	250
参考文献·····	254
后 记·····	267

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目标

近些年来，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不断升温，以往由党史研究者主导的中国革命研究局面被改变，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涌入中国革命研究的领域。这些不同学科带来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大大激活了中国革命研究的潜力，关于这场大革命的形象刻画由此也呈现越来越多元的状态，形成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局面。

随着研究的推进，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已经从宏观的鸟瞰深入到微观的细审，区域史以及单独的村庄史研究成为流行的研究方式。本书亦属于中国革命的区域研究，我们将重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华北地区，对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社会动员进行研究。

众所周知，在江西反“围剿”斗争遭受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被迫展开战略大转移，经过万里长征之后来到陕北，并在抗日战争中进入华北地区。在华北地区，中国共产党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内战的严峻考验，但是结果却与苏区时期有霄壤之别。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华北地区实现了绝境重生，而且最终反败取胜。为何中共在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如此迥异？这一问题无疑是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大关键。

鉴于华北地区的重要性，对中共在华北地区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便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事实上，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在关注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革命经验。例如，以研究“延安道路”著称的西方学者塞尔登（Mark Selden）曾经在20世纪70

年代末就从对陕甘宁地区的关注，转向更多地强调“华北模式”^[1]；而国内学者刘一皋也指出，“华北的地位和经验，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还是在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都更为重要”^[2]，并认为鉴于其重要性，“华北农村社会改造的模式也随着中共在战场上的胜利，推向全国广大地区”^[3]。

本书亦属于对“华北道路”、“华北模式”的一项研究，本书将以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资源集聚与分配活动——亦即社会动员为研究主题，探寻中共在华北地区实现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的经验。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动员的概念

追溯起来，“动员”概念产生于军事领域。从词源学上看，它最早源于普鲁士，德语为“Mobilmoahung”，以后传入法国，译为法语“Mobilisation”，英国人后又将其移译为“Mobilization”。论其本义，该词系指集合（assembling）、装备（equipping）及准备出师作战（preparing military and naval forces for active hostilities）之意。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儿玉源太郎将此词意译为“动员”，此后传入中国，为中国学者所因袭。^[4]不过，随着“动员”概念的广泛使用，人们不再拘泥于军事领域，而将之扩大到众多其他的领域如政治、经济等，变成一个公用的名词。由此，“动员”概念开始泛指集中人力、物力资源为集体服务的任何活动。

《现代汉语词典》同时反映了这两种不同的定义，它将“动员”解释成：①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②发动人参加某项活动。

[1] 塞尔登与弗里曼、毕克伟合作，从1978年开始对河北饶阳县的五公村作了长达十年以上的连续调查研究。研究成果形成专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见[美]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 刘一皋：《中国改革与农村社会——读中国的乡村：社会主义的国家》，载《中国书评》（香港）1994年3月号。

[3] 刘一皋：《20世纪中国社会动员的变换——以华北农村动员组织为例》，载牛大勇、臧运祜主编：《中外学者纵论20世纪的中国——新观点与新材料》，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4] 张羽：《求证“动员”词源》，载《国防》2004年第3期。

然而, 尽管人们对“动员”一词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对此概念的系统分析却并不多见。在西方, 伊兹奥尼(Amitai Etzioni)是少有的对“动员”概念进行了系统分析的学者, 他从宏观社会学的角度对此概念的内涵做了比较全面的揭示。伊兹奥尼说, “最初, 动员这一概念是用来指资源从‘私人—民间’向‘公共—军事’转移的过程。近来, 动员概念则被用来指社会的或其他某种集体故意改变其他资源的控制权”^[1]。伊兹奥尼将动员看成一种有意识的过程, 指出“动员在这里被看作是一个有意识地发起、引导和终止的过程, 而不是社会单位间互动行为的‘副产品’或成果, 也不是无数个体参与者行为的加总”^[2]。另外, 伊兹奥尼特别强调动员的非常态性和迅速性, 认为“与生产或整合不同, 动员不是一个持续下去的过程, 而是限定在特定时期内才会发生的过程。尽管有的社会单位对资源控制的总量不断起伏波动, 但除非在既定时期内发生较快的变化, 那么就没有必要将这种起伏波动也看作动员”^[3]。总起来看, 在伊兹奥尼看来, 动员概念具有三个基本的因素: ①资源从个体向公共集体的集中; ②集中的过程是相对迅速的, 不同于常态的缓慢流动; ③集中的行为是有意识的。因此, 伊兹奥尼将动员概念周全地界定成: “动员是一种某个社会单位用相对较快的速度对此前没有控制的资源进行控制的过程。所针对的资源可以是经济的、军事的, 也可以是政治的(如议会中的支持)、心理的(如对该社会单位的情感、信念认同)。”^[4]伊兹奥尼认为动员对于社会单位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动员是对资源的集中, 而“当资源被集体使用而不是被个体使用的时候, 社会单位就提高了集体行动的能力。因此, 对并非拥有合法所有权或共享权利的资源进行征用, 这种能力是的确重要的”。在他看来, 如果没有进行动员或动员程度更低, 一个资源富有的社会单位也会比一个资源匮乏的社会单位在集体行动

[1] Amitai Etzioni, Mobilization as a Macrosociological Concep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1968): 243.

[2] Amitai Etzioni, Mobilization as a Macrosociological Concep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1968): 244.

[3] Amitai Etzioni, Mobilization as a Macrosociological Concep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1968): 243.

[4] Amitai Etzioni, Mobilization as a Macrosociological Concep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1968): 243.

能力上的表现更弱。^[1]

在具体使用时，人们又常常根据使用手段或所针对资源的不同，对“动员”概念前面加上各种修饰词，变成军事动员、政治动员、思想动员、情感动员等。其中，“政治动员”一词的使用最为频繁。但这一概念的使用也最为混乱，外延伸缩性很大。一些人从广义的角度使用“政治动员”，最著名的是詹姆斯·汤森（James Townsend），他认为“政治动员就是获取资源（这里是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2]。这一定义实际上使“政治动员”已经等同于伊兹奥尼所界定的“动员”。在这种广义界定下，“政治动员”应全面地包括宣传教育、利益激励和组织强制等活动。

然而，“政治动员”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个常见的不同用法。中共对“政治动员”有独特界定，最著名的表述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话，他说：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民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战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情况，联系士兵和

[1] Amitai Etzioni, Mobilization as a Macrosociological Concep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1968): 243.

[2] [美]詹姆斯·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1]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对“政治动员”的使用是狭义的，他将“政治动员”界定为一种宣传教育的活动。在日常使用中，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动员又往往被理解为做思想工作，进行说服。这一含义在中共执政后流行开来，为中国民众所习惯。于是，国内外所理解的“政治动员”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国内老一代的学者大多是按照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界定的内涵使用“政治动员”概念。例如，萧超然等将政治动员与政治组织区别开来，认为前者主要通过政治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和树立先进典型等形式实现。^[2]中国国内的一些辞典也采用了这种解释，例如《中国小百科全书》中的“政治动员”词条是这样表述的：“政治动员是政治领导主体以自身的价值观、信仰去诱导和说服政治领导客体，赢得被领导者的认同和支持，取得被领导者的自愿服从和主动配合，以实现政治决策规定的目标和任务。”^[3]在这一传统影响下，一些年轻的学者如刘荣刚指出，在中国语境中，“政治动员”的实质是指要发挥人的精神作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4]

而国内许多新一代的研究者则像汤森一样在广义上使用“政治动员”一词，把政治动员看成是政治资源集中的一般过程。按照这种方式理解，那么政治动员就不仅仅是宣传教育的过程，也包括利益激励和组织强制等各项活动。^[5]例如，徐彬借鉴新制度经济学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区分方式，将政治动员分成“诱致性政治动员”和“强制性政治动员”两类。^[6]一些研究者则把“政治动员”直观地等同于权力组织的政治运作过程，使用起来更加广义、随便。^[7]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本身也经常资源汲取的意义上使用“动员”一词，并不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2] 萧超然，晓苇，金安平：《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189页。

[3] 《中国小百科全书》第4册，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4] 刘荣刚：《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动员》，载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5] 王华宇：《党的政治动员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及其变化原因》，载徐湘林主编：《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6] 徐彬：《论政治动员》，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

[7] 萧楼：《柔性政权：“政治动员”下的乡镇和村庄——东南沿海D镇个案分析》，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只是把动员理解为思想工作。周祖文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动员’是十多年来研究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一个热门术语。在土地改革、军队征兵等研究领域，学术界频繁使用的主要是‘政治动员’一词。该词在学术界的流行乃至泛滥，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动员’一词在抗战时期的涵义。虽然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材料中也多有‘政治动员’的提法与活动，但‘动员’一词最本源的所指乃是与人力、物力和负担有关，其次才是与宣传相关的政治动员。”^[1]

中共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确更习惯于将“动员”作为征粮征税等资源汲取活动的代名词。例如，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在1944年对中外记者的书面回答中，把动员的对象分为“公粮的运输”、“公盐的运输”，以及“临时动员的担架、运伤兵，修路，帮助军队建筑”中使用的人力、畜力。在《解放日报》上，“动员”一词也用于人力、物力方面：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村“公盐头一次16驮完成了，这次16驮半，刚布置下去，先前说动员牲口去盐池驮，老百姓说天冻，不好行动，听说上面叫改交代金，都愿意”^[2]。

所以，可以理解目前在国内学界中，对“政治动员”一词并存着两种矛盾的界定与用法，一种是广义的界定与使用，将之理解为人力物力等资源的集中；另一种是狭义的界定与使用，将之理解为思想教育与说服一类的活动。这两种动员观由于没有得到梳理，造成了不少混乱，一些研究者不自觉地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动员”概念，在同一篇文章里将其含义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例如，一位研究者一方面认为政治动员具有调动和发挥被动员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被动员者对动员主体的政治认同，以及唤醒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等功能，这表明他实际上是在宣传教育的意义上使用“政治动员”概念；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列举政治动员的方式时除了包括宣传鼓动、受训控制、典型示范之外，又包括了“组织控制、权威支配、蒙蔽性诱导、强制性参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又接近于广义上的“政治动员”。^[3]

为避免矛盾和混乱，本书将主要在广义上使用“动员”概念，若无特别说明，

[1] 周祖文：《动员、民主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实态与逻辑》，载《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

[2] 转自周祖文：《动员、民主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实态与逻辑》，载《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

[3] 王华宇：《党的政治动员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及其变化原因》，载徐湘林主编：《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8页。

本书所用的“动员”一般不是指狭义上的思想教育和说服活动，而是指广义的社会群体和资源的聚集活动，即所谓“社会动员”。不过，需注意此概念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所特别定义的“社会动员”概念不同，按照卡尔·多伊奇的定义，后者乃是“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1]。因此，现代化理论中的“社会动员”主要是指现代化过程中民众在心理层面上的变化。但本书是从广义上使用“社会动员”概念，将社会动员理解为政治集团在一定的集体目标下，对社会分散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相对迅速的集中的过程。^[2]这实际上与汤森所界定的“政治动员”概念接近，不过，为了避免上述两种“政治动员”概念同名异义、易混淆的问题，本书将其中之一更换为“社会动员”的概念。

具体说来，“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有什么关系呢？本书认为，前者包含后者，广义的资源汲取的社会动员过程中往往包含思想、精神层面的政治动员活动。国内一些研究者明确将“社会动员”视为一个综合过程，例如周晓虹在对1949年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社会动员过程进行分析时，将之分成了利益刺激、政治压力和宣传造势三个方面。^[3]换言之，社会动员在外延上包含政治动员。

革命时期，中共在征收粮秣款的“社会动员”过程中，不一定需要采用“政治动员”，可能会直接以赋税、摊派等形式征收；但涉及征兵征夫时，由于困难加大，往往离不开进行“政治动员”。譬如，许多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前，中共各级组织在征收物资上，一般直接使用“动员”一词，但对于扩兵，则强调要进行“政治动员”。为何会如此？主要原因是中共各级组织都认识到扩兵不同于征物，不进行说服就很难完成。例如，1945年8月，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有村干部说，“动员什么也可以，要钱不成问题，要人就无法收拾”^[4]。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反映，

[1] 转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

[2] 杨龙曾将社会动员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社会动员是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狭义的社会动员则指对资源、人力及精神的调动。参见杨龙：《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动员及其特殊性》，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3]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2—173页。

[4] 阜平县委《新兵动员工作总结》（1945年8月30日），河北省档案馆，档案号：520-1-314-4。转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1945年12月，晋察冀边区曲阳县委也发现基层干部认为“死物好弄，活物难说，觉得困难”^[1]。1946年8月，河北唐县县委也总结说“大家都认为动员活物南（难），动员死物易”^[2]。

面对这样的动员难题，在战争中进行扩兵时，中共的上级机构往往会劝告基层干部要进行“政治动员”。例如，1948年山东渤海一地委强调国共第二次内战的性质是人民战争，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无限的贡献其人力物力——坚决拥护与支援这个战争。战争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参军运动的方式就必须是政治动员。所谓政治动员，就是既相信群众能够参军，而又要领导群众，提高群众觉悟，自愿参军。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启发群众的这种自觉性，就是说要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向群众说明这个战争的性质、目的、前途，与群众自己的关系等等，这就是说启发与引导群众，从不自觉到自觉，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自觉、这种饱满的政治情绪，去踊跃的报名参军。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够完成任务”^[3]。

可见，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存在紧密关系，社会动员往往包括获取政治支持、建立共同信念（阶级意识）的政治维度，但其基本含义仍是一种资源的大量、快速的集中过程，这一过程大多是临时性的、突击性的和强制性的。中共的上层领导经常强调政治动员，以争取通过民众的自觉行为实现资源动员的目标。但中共的基层干部往往习惯于为了完成紧急、庞大的人力物力动员任务，采用突击与强制性的手段，对政治动员则缺乏信心和耐心。例如，1948年河北易县一些区村干部在扩兵中，“不相信政治动员说服教育的威力，对政治动员缺乏信心，更有的认为是根本不可能”^[4]。

因此，社会动员是一个更具张力和包容性的概念，本书将以社会动员为核心概

[1] 中共曲阳县委《关于新兵动员初步总结》（1945年12月18日），河北省档案馆，档案号：520-1-305-3。转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2] 唐县县委《新兵补充工作总结》（1946年8月20日），河北省档案馆，520-1-278-7。转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3] 渤海一地委宣传部《打破当前群众的参军顾虑——初级干部学习材料之三》（1948年9月），河北省档案馆，档案号：248-1-27-1。转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4] 易县县委《扩军工作总结报告》（1948年12月31日），河北省档案馆，档案号：520-1-240-19。转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念，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得以迅速壮大的机制。

（二）阶级斗争理论的一般逻辑

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员过程，党史学界一般是根据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解释。马克思不是把革命理解为孤立的暴力或冲突事件，而是理解为在危机重重的社会客观结构矛盾下所形成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斗争运动。

在马克思看来，理解人类社会的钥匙在于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形成的生产方式上，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按照马克思一般的理论公式，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一定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脱节和矛盾。“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1]

而这种社会革命的具体表现就是激烈的阶级冲突，它通过每一种现存生产方式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阶级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统治阶级的战争得到完成。具体说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革命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展开的。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丧失了生产资料，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于是在社会发展中，资本家和工人就因为对生产剩余的剥夺和被剥夺而处于对立状态。随着对立状态的发展，二者分别形成一个统一的阶级，陷入阶级斗争之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诞生：“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2]

进而，马克思认为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集体行动由此开始产生。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变得越来越残酷的时候，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最终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以社会革命的形式爆发出来，从而推动历史社会形态的演进。简言之，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4页。

马克思认为在根源上革命是从生产方式中内生出来的产物，其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具体地看，革命则表现为代表生产力不同发展方向的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反抗的结果。

毛泽东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具体地运用到对农村的革命动员中，强调农民阶级对革命的决定意义。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中国农民受的剥削最多，受的压迫最厉害，已经处于活不下去的境况，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因此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1]1926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进一步强调，“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2]。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成为此后中国革命史叙事的圭臬，革命史学家们将阶级斗争理论确立为支配中国革命研究的解释框架。在这种研究传统下，研究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结构中阶级矛盾的严重程度，重视对农村阶级分化程度的调查，强调土地分配的不平衡及由此引起的农民阶级的怨恨是革命的根源。研究者们认为，共产革命前的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达到了不可协调的尖锐程度，而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觉地提出各项政策措施，忠实地反映、代表革命阶级的利益要求，于是成功地实现了对农民阶级的动员，从而将中国革命不断向前推进。

于是，在阶级斗争理论的解释下，中国革命被简化成两大阶级，以及分别代表这两大阶级的政党之间的斗争。这种解释将复杂的革命历史还原成单一的阶级斗争图景，使我们在革命史的叙述中往往只看到阶级和政党的活动，革命动员也被描述成一个共产党忠实代表了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利益，随之阶级群众被动员起来的固定过程。总之，在传统的革命解释中，阶级动员被看成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关键，对革命史的叙述基本上是围绕阶级动员的主线来展开的。

（三）中国革命的多元解释

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被刻画成单纯围绕阶级路线而展开的历史图景不同，近年来，在其他学科的介入和新理论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视角剖析中共革命历史，展露革命过程的不同断面，发掘出新的因素及由此构成的新矛盾。例如，罗红光在陕北杨家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体会到“生活关系中的地主”与“生产关系中的地主”的不同，他主张从日常生活关系的角度对作为阶级分析核心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要素的“地主”进行重新审视。^[1]再如，在法国大革命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的启发下，黄宗智摆脱以往革命研究的客观主义视角，从革命话语表达的角度重审中国革命，揭示出话语表达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黄宗智发现，阶级斗争的话语表达对于中共的社会动员具有独立的作用，并不完全符合客观结构。话语表达的独立性使得中共在农村发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一直存在“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偏离的问题。这种现象在“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巅峰，以致形成了一种过度偏离现实的“表达主义政治”。此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重新回到强调客观现实的路线上。^[2]又如，李放春试图超越传统的以农民与地主矛盾为主的研究视野，他自觉地提出，“在经验基础上，有没有可能提出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矛盾分析路径或者一种新‘矛盾论’？”李放春认为，“地主”在“土地斗争”中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在北方土改的历史实践中，中共内部对于打倒地主剥削阶级具有基本的话语默契，分歧不大。但是，相比而言，“贫雇农”、“中农”以及更富有争议的“新富农”等问题则存在复杂的争议、波动和纠纷。李放春找到了一条新的矛盾分析路径，他试图用“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框架来重新梳理北方土改的历史过程。^[3]

可见，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者不再满足于仅仅根据阶级理论来解释中国革命，认为这种解释带有结构决定论的问题，对于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过程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新的研究趋势中，研究者们更加感兴趣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制和动员策略。

例如，青年学者黄琨对中共1927—1928年的乡村动员历史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以往这段动员历史的研究“多注重于史实的厘清和政策上的得失，忽略了对这一过程的微观研究”。“在我们以往的观念中，在革命与贫苦农民之间构成了简单的革命勾联，进而只在中共政策中去寻求对历史的解释。实际情况是中共在乡村的进入有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中共的乡村动员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容易成功”。^[4]黄琨运用了许多地方省、特、县委的原始文件和一些县

[1] 罗红光：《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和消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 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 黄琨：《中共乡村动员1927—1928》，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6月号。